

瘟疫为何总让人措手不及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几个月前，英国作家马克·霍尼斯鲍姆正躺在伦敦的病床上，他在发烧，还有间歇性咳嗽，但由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缺少检测试剂盒，他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是新冠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

患病期间，他为自己一年前完成的著作《人类大瘟疫》重新撰写了前言“未知疾病X”。一场大疫忽然降临，历史与现实再次叠合到了一起。

传染病从未远离人类，可为何每一次，人类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人类大瘟疫》试图为这个历史的迷思寻找答案。

跨越时空的叙事

《人类大瘟疫》的叙事是从20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开始的，全书共选取了近百年来全球暴发的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包括鼠疫、鸚鵡热、军团病、非典、埃博拉、寨卡等，作者通过档案、书信、日记、新闻报道、广告、访谈等来源，详细梳理了每次疫情中，公众、社会、国家和公共舆论等各个方面的反应，复原了当年的历史故事，兼具了故事性和学术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评价霍尼斯鲍姆对传染病史的书写，“是随着疫病感染轨迹布局的，跨越了时空、边界、国族和文化”。

例如，关于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的叙事，作者将时间线索向前追溯到1889年的俄罗斯流感，向后涉及到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一直延伸至20世纪90年代，描述了美国病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如何从死于1918年流感的阿拉斯加女患者身上获取病毒基因片段，直到2005年发现病毒毒株基因组序列，从而揭开西班牙流感暴发的真相，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

高晞认为，作为科学记者的霍尼斯鲍姆在书中还不至于新闻角度的宽度和热点。比如，他在讲述1924年洛杉矶鼠疫事件时，通过报纸广告和市政规划，分析了美国东西海岸两大城市——纽约与洛杉矶的政府和商人的不同反应，从而揭示出在这场疫情处理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商业地产商在影响着政府的抗议决策。两大城市及其媒体间的商业竞争引导了公共舆情，致使社会撕裂。

在讲解鼠疫杆菌发现的科学过程时，作者将视野转向中国东北，回顾1910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鼠疫惨状，解释中国科学家伍连德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如何形成科学家共同体，在实验室里确认鼠疫杆菌的存在，绘制了一幅20世纪全球抗击鼠疫的历史画卷。

你拥有健康的依恋关系吗

■本报记者 袁一雪

原生家庭是否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这个问题在心理学界并未有统一的答案，但从某个角度来说，成年人背后确实藏着童年的影子。

你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对待你的方式，甚至在婴儿期，父母是否及时回应了你的需求，都会或多或少对你在配偶选择和对待孩子的方式上产生影响。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父母和婴幼儿的早期依恋关系》一书，从孕期开始，探讨了父母对孩子胎期、婴儿期和儿童期的影响。

原生家庭的影响从受精卵开始

书中开篇便写道：“每个女人怀孕都是她受孕前的全部生命的投射。她与自己母亲的相处经历，她所经历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以及促使她逐渐适应、最终带领她与父母成功分离的力量，都影响着她对新角色的认识和调整。”

一个在母体内的胎儿已经开始受到母亲情绪的影响。然而，人们曾经对婴儿的情绪不以为然，更不用提对胎儿的重视了。那时，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婴儿很小，什么都不知，什么也不记得，所以成年人往往忽略婴儿的感受。现在依然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当时心理学主流学派是行为主义，强调外界刺激与行为反应。在儿科领域，医生认为只要给婴儿提供无菌的治疗环境就好，甚至阻止父母去陪护，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婴儿。整个社会都在忽视婴儿与主要抚养者（主要是母亲）建立情感纽带的需要。

后来，有研究者发现，婴幼儿慢慢发展出一套依恋行为：母亲离开时抗议，母亲回来时欢迎，害怕时抱紧母亲，母亲走到哪儿就尽可能跟到哪儿。此类行为是天生的，这是基于“亲近母亲有利于存活，因此婴儿会产生满足感”的生物学事实。这种亲近的形成、维系、修复，能够带来爱、安全与愉悦的感受。相反，这种亲近发生持续或不适时时的中断，则会令孩子焦虑、悲痛和抑郁。

1944年，一篇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人类社会潜藏已久的种种弊病。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次疫情的发生，也是人类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的机会。”

《人类大瘟疫》,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著, 谷晓阳、李瞳译, 中信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定价: 78元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

尽管是个案式的叙述，但是，每一章传染病的故事都非常复杂。霍尼斯鲍姆想要强调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疾病流行和发生模式中，除了科学以外，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不仅极大地左右了人们对疾病的感知，更是影响了社会对疫情的应对。

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的非典，以及后来的埃博拉和禽流感，大多数疫情都可以追溯到从动物到人类的溢出事件。其中一些溢出事件可以通过改善卫生状况和定期检查野生动物市场来预防，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失调或者是病原体习惯居住的环境的改变。

就艾滋病而言，20世纪初蒸汽船开始在刚果河上航行，以及殖民地时期期的公路、铁路的修建是艾滋病扩散传播的重要促成因素，伐木者和木材公司的贪婪也是罪魁祸首。此外，如果铁路公司和木材公司的劳工营地附近没有野味买卖和遍地的嫖娼卖淫风气，病毒很可能不会传播得如此广泛、迅速。

同样，如果没有西非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特别是人们固守传统丧葬仪式和对科学、医学的不信任，埃博拉也就不会演变成一场重大的区域性流行病，更不会演变成全球卫生危机。

再比如，当寨卡疫情宣告结束后，巴西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目前，在南美洲、非洲、亚洲的大型城市，还有大量人口集中在拥挤且不卫生的空间里，为新病原体的扩散和传播提供理想场所。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对这些地方而言，真正难以应对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贫穷。

“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人类社会潜藏已久的种种弊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告诉《中国科学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次疫情的发生，也是人类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的机会。”

人类的傲慢

“每个人都知道，瘟疫在这个世界上会反复发生。”加缪在他的小说《瘟疫》中写道，“然而，不知何故，我们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什么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们头上。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样频繁发生，而瘟疫和战争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霍尼斯鲍姆在总结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应对瘟疫大流行的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时也提到，“尽管我们可能在过去被称为‘空白区域’的地方更好地监控大流行的威胁，但我们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忘记医疗历史的教训。”

就在2019年初，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世界各国大流行病防备能力的年度审查报告。在霍尼斯鲍姆看来，这

份报告简直是触目惊心。

2011~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172个国家追踪了1483次疫情暴发。基于当时的疫情发展速度，全球应急预备与监测委员会十分担忧。

“现在，一场传播迅速、高度致命的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正切实威胁着我们，它将会导致5000万~8000万人死亡，并造成将近5%的世界经济损失。”该委员会警告，“长期以来，我们在应对大流行时一直处于‘恐慌’和‘忽视’的循环……我们早该采取行动了。”

在书中，霍尼斯鲍姆直指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人类的傲慢、狂妄自大。比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西方科学界固守在细菌理论范式之中，迟迟不能正视这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1924年洛杉矶鼠疫期间，当地政府并非出于控制感染，而是因种族歧视对疫区进行了隔离检疫；2013年中非偏远森林地区埃博拉病毒暴发，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对西非构成威胁，更不用对纽约、达拉斯等城市产生影响……

“现代科技的发展让大家对防疫能力有了无限的想象，觉得瘟疫是一个我们可以征服的对象。”在余新忠看来，这恰恰说明，人们对科技的信念是缺乏足够的弹性的。

“20世纪以来，是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可同时瘟疫出现的频率也显著上升了。这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人类应对、控制瘟疫或者说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概率也更高了。”

余新忠表示，当人类可以掌控瘟疫的想法一再破灭，今天的我们已经开始有所警觉，尤其是对通过科技的进步征服瘟疫的想法有所反思。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历史的经验、教训带给人类的理性反思和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之间是有落差的。”余新忠说，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给瘟疫的发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人类没有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或是认为面对疫情人类总是很失败。

“虽然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强，疫情的发生概率更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疫病对于人类产生的实际伤害是在降低的。”余新忠说，“而且，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我们应对、控制疫情的投入还是巨大的。”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对瘟疫的控制能力在进步。余新忠认为，未来，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学会与致病微生物乃至自然更好地相处。“瘟疫不可避免，但我们仍可以用理性和智慧，减小它们对人类的伤害。”

养儿也可重建依恋关系

没有时间疗伤、带着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的成年人，可能在亲密关系、婚姻关系中重复原生家庭的关系状态。“比如你父母对你施虐，经常贬低责骂，甚至暴打，而你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也是这样，那这显然就是一个关系重复了。”施琪嘉解释并建议，“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原生家庭有问题，那么可以找个和原生家庭不一样的，也就是原生家庭以外的关系，比如朋友关系、师生关系、伴侣关系。如果这些新的关系能够滋养你，那么这个滋养本身就能够使你改变。”

而且，施琪嘉认为，对于那些原生家庭存在问题的人来说，“生孩子是把双刃剑”。“有的人发誓说，我一定不会像我的父母对我那样去对待孩子。即便在意识中发了誓，可是在养育的过程中，他很多时候还会重复父母对他的模式。如果你的父母对你不好，但你却对你的孩子做得很好，那么可以说，孩子就是你的治疗师。所以说这是把‘双刃剑’。你在与孩子相处的关系中，重建了你与父母的关系。他让你学到了如何去做好父母的。但无论怎样，这都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觉察到你的关系是有问题的、你有没有决心去改变它，以及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它。”

关于依恋关系，施琪嘉还额外推荐鲍尔比写的“依恋三部曲”，即《依恋》《分离》《丧失》，“如果大家能够把依恋三部曲和《依恋的形成》一起读，可能会对依恋理解得更加完整和全面”。

他同时表示，理解了依恋关系，读者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童年、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并且为成为父母做好准备。“关于依恋关系，不仅仅需要治疗师了解，同时也需要很多年轻人和中年人以及早已为人父母多年的成人了解。”施琪嘉说，“如果你真的意识到有问题，那么不妨放慢时间，因为疗伤的过程是一个放慢速度的过程。你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和孩子待在一起，和他慢慢地讲话、讲故事，慢慢地看风景。”

荐书



《马丁·路德·金自传》, [美] 克莱伯恩·卡森著, 徐茵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定价: 59元

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本书脱胎自卡森于1985年受马丁·路德·金的家人之邀主持的“马丁·路德·金博士文稿项目”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书中用马丁·路德·金自己的语言，为他编纂了这部历史性质自传。“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到马丁·路德·金的情形。那是在1963年3月……我是聚集在倒影池周围的数十万民众中的一员，一名19岁的大学生。”作者曾追随马丁·路德·金参与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并由此展开了对美国黑人运动的研究。他曾撰写与编辑过多部美国民权运动著作，也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这部自传反映了马丁·路德·金宽广的胸襟、深刻的思想，以及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还涉及了他对如圣雄甘地、约翰·F.肯尼迪等杰出人物的看法。



《人文主义地理学》, [美] 段义孚著, 刘肖群、陈金凤、张盼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定价: 45元

段义孚是享誉全球的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的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以及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段义孚认为：“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与传统的地理学有所不同，段义孚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现象，而是以人的生存作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重在探究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

本书是他作为地理学家所认识和经历的一切的见证，在书中他反思了之前所有作品的内容。



《入世与离尘：一块石头的游记》, 王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6月出版, 定价: 48元

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阅读《红楼梦》的心得笔记。书中从红楼的布局、立意、诗句、用字等方面来细读红楼，讲解《红楼梦》这部“情书”与“悟书”。借助于金陵十二钗不同的生活，作者进行的是具体而普遍的生命反思，追问的是永恒的生存意义。而全书的主角贾宝玉，在三个世界中游历穿梭，完成了“迷失—觉悟”的入世和离尘的过程。

作者王博是北京哲学系教授，在他眼中的“红楼”是有哲学色彩的，因对道家、儒家、佛家谙熟，他认为，《红楼梦》中呈现的儒家、道家、佛家的对话与冲突，丰富了各种生命形象，让悲剧呈现出更深刻的意义。



《菲利普·迪克传》, [美] 安妮·迪克著, 金雪妮译, 新星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定价: 89元

本书由美国传奇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第三任妻子安妮执笔，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迪克的传记。

菲利普·迪克是对世界当代文化影响最深刻的科幻作家之一，也是被学术界研究最深入的科幻作家。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包括《银翼杀手》《少数派报告》《全面回忆》等。在短短54年的生命里，迪克留下了44部长篇和121部短篇，被誉为“科幻作家中的科幻作家”。

在这本传记中，安妮以亲密之人的独特视角，揭示了菲利普·迪克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的真实人生。本书通过大量的书籍、访谈、书信，展现了迪克的写作生涯与感情世界，还原了他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的原型，让读者看到作家最为真实、最为美好也最为可怕的一面。（喜平）